



海派文化丛书

俞
可
著

海上教育家

 文匯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

海上教育家

俞 可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教育家 / 俞可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41-840-5

I. 海… II. 俞… III. 教育家—生平事迹—上海市—近代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991号

海上教育家

作 者 / 俞 可
丛书主编 / 李伦新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特约编辑 / 项纯丹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90千
印 张 / 15.75

ISBN 978-7-80741-840-5
定 价 / 35.00元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吴谷平

方明伦
徐中玉

邓伟志
钱谷融

庄晓天
龚心瀚

严家栋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忻平

丁宏根
陆廷

王晨
郑家尧

李友梅
桂国强

李伦新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

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 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

《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

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20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前言

一

百年世博梦，百年强国梦。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

实现强国梦的一条主要路径便是教育救国教育强国。

“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学之强由于学。”（张之洞《弟子记》）

“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康有为《〈教学通议〉序》）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

“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根本救济，端在教育。”（《严复集》）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

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大国乎！”（《胡适留学日记》）

.....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在上海，在这儿，他在中国做了第一场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之窗口和缩影。

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格致书院；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正蒙书院；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务本女塾；

民主革命派创办的第一所女学校——爱国女学校；

中国第一所自办的私立大学——南洋公学；

中国第一所自办的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

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

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

中国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

值2010世界博览会在沪举办之际，在教育领域，首先要追忆那些百年之前就怀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理念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教育家：

从毁家兴学的马相伯到血洒申城的刘湛恩；

从“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盛宣怀到“拆掉四堵墙”的钱

伟长；

从“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的吴馨到为女子教育奉献终生的薛正；

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黄炎培到“鸡毛飞上天”的吴佩芳；

从“中国的马卡连柯”段力佩到新中国基础教育“活化石”的吕型伟；

从“怎么能给一个亡国的君主做老师”的颜永京到“甘为红领巾的孺子牛”的段镇；

.....

二

教育家办学。

这个关键词耳熟能详。

温家宝总理2007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

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再次强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2009年教师节前夕，总理又一次把教育家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提升到历史新的高度。

2010年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着重指出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长，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成为教育家,可谓是千百万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

而自2005年启动的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以及评选出两届的“上海市教育功臣”项目,更是从上海地方行政的宏观视角明确一个理念,即大上海需要自己的大师名师,由此打造“海上教育家”群体。

何为教育家?

《教育大辞典》把“教育家”概念定义为:“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

这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对教育家的粗线条勾勒。

“教育家”概念的词源难以考证。

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孙中山就发表《民国教育家之任务》的演说。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①: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备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不过,“教育家”概念还是过于抽象。

要形象化理解这个概念,最好拿一个公认的教育家来剖析。

陶行知,众望所归,并被毛泽东追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本人也较早系统应用并论述“教育家”概念。他把一流教育家定义为拥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即是开辟精神”之一要素者^①。前一种要素指的是国民教育的时代性，后一种是其普适性。国民教育即全民教育。正因为国民学校肩负恩惠并形塑全民之重任，校长应该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渐渐地要做成社会的领袖”，陶行知最终道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这个经典论断。此句出自他1924年撰写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②，可见，此校长指的是中小学校长。

然而，本书却偏偏以五位百年前的沪上大学校长来代表海上教育家。

三

2009年盛夏，学校发展国际网络组织(Network School Development)缔造者Dr. Hans-Günter Rolff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教育政策顾问Dr. Klaus Walter Klemm教授结伴，以火车为交通工具，横穿整个欧亚大陆，一路观光，目的地北京。

他俩是我的忘年交，在中国土地上也只认识我一个，便早早就通知我，让我赶赴北京欢聚。

由于正值共和国六十大庆，京城大量景点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正处于修缮之中。游览不成，我就跟他们侃得海阔天空。

我说到本人近几年发起的“中德高等教育论坛”(German-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orum)和“教育领导中德高端对话”(German-Chines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ummit Dialogue System)，前者是针对高等教育的，后者则基础教育。隐隐感觉到，国际教育研究界有一个普遍的现

① 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② 陶行知：《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